

# 中国:守望相助、维护尊严的多元共同体

纳日碧力戈

(贵州师范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摘要:**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各民族政治协商的成果,不同程度地照顾到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利益,它是家国认同的制度保障;守望相助和互守尊严是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情感依托和心理基础。

**关键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守望相助;互守尊严;多元一体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5)01-0082-04

**DOI:**10.15899/j.cnki.1005-5681.2015.01.016

## China: The Pluralistic Community of Offering Timely Help and Maintaining Dignity

*Naran Bilik*

**Abstract:** The system of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 of China is the achievement of political consultation of all peoples. It concerns about most peoples and minorities' benefits. It is also the system guarantee recognized by the family and country. Offering timely help and respecting each other is the emotional supporting and psychological base of cultural pluralistic and political community.

**Key words:** The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 System; Offering Timely Help; Respecting Each Other; Pluralistic Community

2014年9月28~29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的民族问题、民族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坚定信心决心,提高做好民族工作能力和水平。至关重要是,会议文件再一次肯定65年来民族理论和方针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民族工作是成功的。这样,从中央和国家的层面,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再次得到确认。会议文件要求用法律保护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对于弱勢的少数民族群体来说,所有这些都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从各个民族共同利益出发,多民族的中国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无疑是最佳的制度选择,体现了各民族利益重叠诉求,也照顾了少数

民族的最基本利益,也尊重了他们的感情。

最近一些年,在强烈民族主义的鼓舞下,也借助经济上的腾飞,一些社会精英急躁起来,希望尽快实现“同文同种”的愿景,希望把少数民族立即同化掉,以“确保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一时间,少数民族似乎成了众矢之的,“累赘论”、“隐患论”、“威胁论”,甚嚣尘上,流行社会,成为压倒性话语,在少数民族社会中造成思想混乱,后果严重。从少数民族角度看,民族区域自治在制度上保障了他们的切身利益,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少数民族有权保持和发展自己语言和文化,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以便促进人才培养、经济改善和社会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取消少数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权利,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存权。

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各民族关键符号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研究》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3AZD057。

收稿日期:2014-12-21

作者简介:纳日碧力戈(1957-),男,蒙古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贵州人类学与民族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基地教授 博士生导师,人类学民族学领域长江学者,主要从事族群与民族、指号人类学研究。

## 二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把少数民族看成是“隐患”或者“累赘”是由于不了解情况,尤其是不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以己度人,一厢情愿,难免偏激。长期以来,有关中国多民族多文化的常识仅限于少数民族地区,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由来及其协商博弈的过程,也不属于多数内地民众的认知领域。许多人由于不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容易把少数民族享有的某些优惠,说成是单向无偿的“照顾”,是制造“不平等”,要求予以取消。他们似乎并不知道少数民族的重要贡献,也不理解少数民族的具体困难,更不明白少数民族的情感经历。有关少数民族对于国家建设的贡献,有关他们的主体性,有关他们的尊严,有关他们的信仰价值,有关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有关他们的情感诉求,都要成为我们民族再教育的重要内容,尤其在那些非边疆地区,这样的普遍教育已经不容推迟,不容忽视,不容“走表”。各民族的交流交融要从民族再教育做起,交流交融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是双主体的,是互主性。单纯从某一个民族的角度考虑问题,乍看起来很有道理,貌似真理在握;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各个民族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民族的观点,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历史也并非一条直线,并非那么清晰可见,而是充满不确定性,有风险,有博弈,有妥协,也有共识。且不提公平正义,不提伦理美德,仅从功利和实用出发,各民族需要在政治协商和利益协商中懂得妥协和让步,懂得如何照顾对方利益的前提下争取自己的利益,否则就不是双赢,就会造成不可调和的冲突,很可能造成“双输”,而不是“双赢”,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不愿意接受的结局。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大民族和国家需要给他们留出一定的空间,包容他们的语言文化,包容他们的信仰价值,包容他们的切身利益,也包容他们的情感需求。如果把国家看成是我族我群独享的国家,那就会排斥其他民族和其他群体,或者把他们看成是需要同化的对象,或者把他们看成是需要驱逐的人群,或者把他们看成是潜在的威胁,就会剥夺他们语言、文化、价值、利益和感情的空间,让他们失望和绝望。

“各民族共同开发河山疆域,共同创造历史”,这是各民族都乐于接受的表述。无论国家还是民族,没有经济腾飞是万万不能的,但经济绝非万能。对于民族关系来说,除了经济上的守望相助,文化和尊严上的守望相助已经变得格外重要,丝毫不亚于经济上的守望相助,有时还会升为首要。

2014年12月10日,Malala Yusafzai和Kailash Satyarthi在挪威奥斯陆获得诺贝尔和平奖,Malala来自巴基斯坦,Kailash来自印度,对于这两个“敌国”来说,这多少有点“尴尬”。但是在电视屏幕上,接受BBC记者Stephen Sackur采访的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尴尬”,他们为儿童奋斗,经历了生死考验,Kailash把Malala认作自己的女儿,人间大爱超越了国界,超越了偏见。共同的命运会拨动人类心弦,让他们的心灵发生共鸣;同样,被拨动的心弦和发生共鸣的心灵,会让人们寻求和发现共同的命运,这是一个“互构”的过程,是一种积极的努力。有了感情上的沟通,有了大爱,人们就能够克服各种困难,超越各种障碍,达成重叠共识,进入“美美与共”的境界。

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文件特别提到了“彝海结盟”的故事,根据网络上的记载:

工农红军高级领导人刘伯承过大凉山时与当地的彝族果基支头人果基小叶丹歃血盟誓,结拜为兄弟,使得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刘伯承高高地端起瓷盅,大声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同果基小叶丹在彝海子边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完后一口喝下血酒。果基小叶丹笑着叫“好”!也端起瓷盅来大声说:“我小叶丹同刘司令结为兄弟,愿同生死,如不守约,同这鸡一样地死去”。说完后也一口喝干。当着众人,刘伯承将随身带的左轮手枪和几支步枪送给了果基小叶丹。果基小叶丹也将自己骑的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

“彝海结盟”让红军和彝族果基支系结下友谊,为后来中共的民族工作留下宝贵经验,这也是民族工作会议文件中提到的和“争取人心”有关的传统经验。处理民族关系,首先要有诚意和真心,不能模棱两可,更不能敷衍了事。费孝通先生在《行行重行行·甘南篇》中记载了他和嘉木样大师同车去拉卜楞寺参观时遇到的情景:

车子一停,他们(指藏民——引用者)就一拥而上,把头伸过来,意思是要求我们摩顶,有人甚至用头冲撞我们的汽车,这些行为,完全是他们内心世界一片虔诚的自发流露。我对他们真是感愧交加。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是有理想的人,没有理想怎能这么虔诚?<sup>[1]</sup>

民族工作和民族团结需要真气和真情。费孝通教授有真气,也有真情,他对少数民族能够“感愧交

加”，没有歧视，没有偏见。他是一个敏感的人，是一个有远见的人类学家。反思起来，我们有不少学者丢掉了这样的“感愧”，他们对少数民族的困难处境麻木不仁，他们把人看成机器，把市场看成万能，认为“机器关系”就是互相倾轧的冷酷关系，就是纯粹交易的市场关系。其实，人和人、人和自然、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应当是一种礼让关系，我说你好，你说我更好，这就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只有承认差异，只有文化平等，各民族才能够美美与共，共识重叠，进入一个生态世界。因此，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要建立在充满“感愧”的心灵沟通和感情共鸣之上，有了这样的沟通和共鸣，就会有民族之间的互相信任和互相关爱，就会守望相助，共同建设和睦家园。民族关系，重在人心；人心所向，万象归随。

### 三

回顾往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是各民族精英长期互动协商的结果，有冲突，有合作，有误解，有关爱。毛泽东说过，少数民族的最大贡献是在政治上承认了中华民族；少数民族地区宝贝多。他说：“蒙绥合并问题要开两扇门，一扇门是蒙人要欢迎汉人进去开发白云鄂博铁矿，建设包头钢铁企业；一扇门是汉人要支持把绥远合并于内蒙古自治区，实现内蒙古统一自治。”签订十七条协议时，毛泽东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天，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商量着办就能办好。他还对西藏上层领导人士说过：你们西藏回到新中国大家庭是有很大资本的，要不然我们的国界就在四川省的边上了。

一九四六年，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的代表刘春，与当时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领导人哈丰阿和特木尔巴根谈判，涉及取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解散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改由中国共产党主持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哈丰阿不同意由乌兰夫担任主席，提出要由博彦满都来当主席，乌兰夫同志改任副主席，因为东蒙不熟悉乌兰夫，而博彦满都在东蒙有影响，由他担任主席更有利于开展工作。刘春与哈丰阿和特木尔巴根个别交换意见，告诉他们，虽然说博彦满都原来也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可是他毕竟是伪兴安总省的省长，追随日本人这么长一段时间，实在不能和乌兰夫相提并论。结果，特木尔巴根马上同意由博彦满都当副主席，由乌兰夫任主席。但是哈丰阿有所保留，说这要由博彦满都自己定。他们当天晚上就找博彦满都谈，

第二天早晨告诉刘春，博彦满都同意乌兰夫继续担任主席，他自己当副主席。这个问题就这样定了。<sup>④</sup>其实，这段共识的达成背后另有一段故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刚刚结束，内蒙古东部的包玉琨从王爷庙来到张家口，带来特木尔巴根写给佛鼎、云润、德勒格尔等三人的一封介绍信。乌兰夫同志看了介绍信以后，不知道特木尔巴根是谁。他后来才知道，特木尔巴根就是和他同在苏联留学的张成，乌兰夫在苏联的时候，只知道特木尔巴根的汉名，而不知道他的蒙名。当时特木尔巴根在东方大学，乌兰夫在中山大学，后经共产国际派回国，乌兰夫同志在内蒙古西部工作，特木尔巴根在东部活动。“双方原来都不知道谈判的对手是谁，没有料到老友重逢，久别之后，又会使在一起，都很高兴，这就为以后的谈判带来了有利因素。”<sup>⑤</sup>

正是由于乌兰夫和特木尔巴根这段“苏联经历”让他们在感情上有了沟通，容易达成共识。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法宝：晓之以理，更要动之以情。采访老一代领导干部，他们都感叹那个时代的汉族干部中有不少人懂蒙古族的语言和文化，蒙汉感情容易沟通，工作开展得顺利，各民族互相信任，产生了大量儿女亲家。民族关系融洽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落实有直接关系，落实得好，关系就融洽。

抚今追昔，温故知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是各民族长期协商共生、命运与共的历史选择，不是单方面的“赐予”，不是心血来潮的冲动，更不是对于形式的“错判”。从“三区革命”到“东蒙自治运动”，从阿合买提江到梁聚五，通往民族区域自治之路充满曲折，来之不易，去之不可，只能完善，不可动摇。

### 四

在民族主义全球化扩散，我群中心主义网络化传播的当今世界，以大民族主义为先导的各种民族主义依然挥之不去，以千张面孔出现，以万种情愫表达，需要不断加以警示，通过自觉和他觉予以克制。根据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民族关系出现问题，大民族<sup>⑥</sup>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小民族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大民族主义是“先发制人”，小民族主义是“后发制人”，后者是对于前者的“刺激反应”。要解决民族矛盾，首先要从大民族做起，然后从小民族做起，大民族的问题解决了，小民族的问题就好办。

民族现象会长期存在，不可能指望一日同化三天消融。民族是人类差异的一种，具有顽强的生命

力,从家族、血统、谱系、生殖等“直觉建构”中,获得无限的想象,汲取丰富的隐喻,在民众心目中是不言自明、不容置疑的“元真理”。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元真理”不仅来自想象,不仅属于心理表象,还有超强的能产性,可以通过想象和表象制造事件,构成事实,让“生米成熟饭”,既成事实反过来又证明了这种“元真理”的正确性、稳定性和不容置疑。民族偏见就是制造这样一种既成事实的“机器”:我们民族的血统“高贵”,语言优雅,文明发达;他们民族的血统“卑贱”,语言粗糙,文明缺乏。在这样的民族偏见的作用之下,歧视外族,排除异类,成为“理直气壮”的社会行为。持民族偏见者或致力于同化他族,或投身于驱逐“胡虏”,以对外排斥换取对内凝聚,每当发生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经常起到转移视线、一致对外的作用。

从加拿大到西班牙,从不列颠到美利坚,从印度到中国,民族关系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不可偏激,不可松懈,需要耐心协商,遇事不慌,有礼有节,因地制宜,求同存异。美国虽然有过震撼人心的民权运动,有过马丁·路德·金的献身,种族事件却连续出现,最近奥巴马总统敦促国人继续和种族主义作斗争,几乎所有人都承认,美国的种族问题和种族矛盾并没有解决,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

根据切罗基印第安人的说法,人生下来肚子里就有两头狼,一头是好狼,一头是坏狼。喂好狼,好狼出来;喂坏狼,坏狼出来。种族主义和民族偏激主义就是那头坏狼,喂好了就出来,张牙舞爪,要吃人。要和种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作斗争,就要喂“好狼”,不喂“坏狼”,时刻保持文化自觉,保持民族反思,学会“美人之美”,提倡“美美与共”。

## 五

最近国家领导人提出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对于建设中国这样一个守望相助、维护尊严的多元共同体来说,这是一个利好的信号。一方面,有关中国民族关系的学术思考和政策定位进入了一个不确定阶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相关民族政策需要完善和创新;另一方面,和平正义、团结互助仍然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确定性的背后仍然存在光明面。在全球信息流通的环境下,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民族关系的紧张,但社会人群并没有放弃和谐共生的愿望。

过去的中国是多族交互性的历史,既有先后的交互治理,也有横向的交互关联,从个体到理念,都

有顶针续麻式的“家族相似性”,即各民族的群体和个人互动互助,在命运上交错交融,在利益上彼此嵌入。他们从来就不是一个吃掉一个的关系,而是守望相助的关系,如同纤维缠绕,股股扭结,形成结实实的“绳索共同体”。

席慕容的歌词“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很有教育意义:爱父母、爱子女、爱家庭、爱民族、爱国家,形成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互不矛盾。有不明真相者提出要“淡化民族意识”,要加以调控,以防止爱族甚于爱国,以爱族代替爱国。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并没有现实的根据,也充满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首先,你如何知道某人某族有民族意识?那是因为你自己有民族意识,否则你不会感到别人有民族意识。正是你的民族意识为他人赋予了民族意识或者激发了对方的民族意识。其次,民族意识是自然存在,是民族关系的心理形式,有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就有不同民族的自我意识,淡化和调控属于一厢情愿,最终是徒劳无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不存在必然冲突,它们之间是上位和下位的关系,是递进的关系,而不是取代的关系,也不是冲突的关系。

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遗产是祖先智慧的宝库,是其国民属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否定它,就是否定其国民身份。创新性的核心价值观建设,有必要把少数民族的优秀精神文化和美好祖先智慧包容进来,与多数民族的优秀精神文化和美好祖先智慧交融一体,形成各民族“绳索共同体”的价值体系。

尊重他人,尊重他族,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就是尊重家人。世间万物互为环境,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当代和未来的中国是守望相助、维护尊严的多元共同体。

### 注释:

①大民族不仅限于汉族,还包括人口在千万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中的“大民族”。

### 参考文献:

[1]费孝通.行行重行行·甘南篇[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218~219.

[2][3]刘春.内蒙工作的回忆[A]/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后(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五十辑)[C].59~60.41.54.

[责任编辑 马成俊]

[责任校对 马伟]